

### 壹、哲思

談到中國的傳統倫理，總讓人想到「仁」。一般認為：中國傳統倫理就是「仁」的實踐。「仁」是什麼？在《論語》中說的次數最多，也最不容易歸納其含義。這是因為孔子談到仁時，總因對話的情境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明的緣故。從仁的構字來看，仁從二從人，這是表示『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的意思。在字典中，仁的譯文是：benevolence; humanity; mercy; charity; magnanimity(度量寬大); kindness 等的綜合義，它的延伸義有：仁民 to be philanthropic, 仁愛 love, 仁義 love and justice, 仁厚 benevolence and generous 等<sup>①</sup>。這些含義，也都表示中國人認為人與人之間應有的關係。

牟宗三曾以西方的哲學體系來詮釋儒家思想的形上學。他認為：儒家思想的源頭是生動活潑的「怵惕惻隱之心」<sup>②</sup>。孟子說「惻隱之心」是人之異於禽獸的本源，人類的文明化育之所以不同於禽獸的聚落，就僅僅是基於這惻隱之心。宋·明理學家則稱此惻隱之心為「良知」、「良能」。

牟宗三認為，惻隱之心的實踐就是「仁」的表現。「怵惕惻隱之心」的性質可以用「覺」與「健」來概括。「覺」是指有「反省」、「明白是非」、「覺悟」的能力。此中有理性，也有感性。「健」即「天行健」之健，意味著君子之自強不息。孔子曾教導弟子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健」，有生之日不可言息<sup>③</sup>。是故「健」也有「有生命就有它」的寓意；換言之，「怵惕惻隱之心」是每個人有生具來、不會消失的。許多中國故事，述及有人「喪盡天良」，然而終有一天會「天良發現」。這表示「怵惕惻隱之心」可以被矇蔽，但不曾失落<sup>④</sup>。

由於人人皆有惻隱之心，而此心又是人之異於禽獸的核心關鍵，所以整個儒家思想是以人為本位。這思想明確的表現在儒家思想的目標上，即關心人民的福祉。用現代的話說，即為了提昇群眾的生活品質。例如，孟子曾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以此目標而言，儒家思想中有效益主義（utilitarian）的成份，也不忽視個人的基本權益，所以也有個人主義的成份。在下一節談到儒家倫理的實踐時，對此將有進一步的說明。

「怵惕惻隱之心」是人人皆有的，所以，孔子說：「舜何人也，禹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sup>⑤</sup>。這是人人皆可以為聖賢的思想，也是儒家理想主義（idealism）之所以可行的依據。

前文已述，「覺」是指有「反省」、「明白是非」、「覺悟」的能力。這是人類文明能自覺地發展、進步、革新的能力所在。動物則無此自覺。覺中有理性，也有感性。儒家是情理圓融，即兼顧「情、理」的一種思想，並不偏重於一方。所以，中國人處理事務，常思「情、理、法」兼顧。最近，紐約時報有一則報導，說認知心理學的學者最近研究發現，人們屈從社會公意（social conformity）的行為是由主司認知（理性思惟）的腦域

來處理；而個人信念的獨立判斷，則在腦部處理感情的區域活動⑥。這個研究可以認為是支持兼顧「情、理」做法的一個旁證。

儒家思想兼顧「情、理」，其中自有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成份。所以，討論至此，我們可以說：西方倫理的理想主義、理性主義、以及個人主義等三大流派的觀點⑦，儒家均已觸及，並融和在儒家的倫理思想中；融和後呈現的面貌，雖然與西方倫理不同，但二者基本上畢竟的相容的。這觀點可以讓我們以融合東、西方思想的方式，來探討、規劃資訊時代的倫理。

孔子曾從「情、理、法」三個角度思考倫理的實踐。這是典型的中國人思惟模式。讓我們舉一個案說明。某人偷了鄰居的羊，有人問孔子：那人的兒子知道此事，該不該報官？孔子說，兒子不應該立刻報官。這樣的回答，似乎表示孔子不鼓勵守法，其實不然。孔子又說，兒子應該先向父親說明不應該偷竊，並勸父親向鄰居道歉，把羊還給鄰居。從法治的觀點（理性），犯了罪，當然要依法懲處。可是，懲處的結果雖然依法「正義」得以伸張，可是，該父子失和了（情，感性），家庭破碎了（情與理），進而會影響鄰居、社群、社會、國家的安定與和諧（理性）。所以，孔子的回答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解決方法，始終沒有偏離倫理的目標—即關心人們的福祉。

中國人認為：人是有情，不能只從法的方面思考。對情而言，和平、和諧是非常重要的，比方說：若心中忿怨不平，一定影響到團體的安定，進而損及團體的利益。是故中國人，一向重視團體的和諧。又中國人認為家是情重於法的地方。家中成員的關係是靠倫理來維持，而不是靠法律；如靠法律則家易破碎。這觀念是較務實的，不僅僅考慮事情依法該怎麼做，更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倫理的目標。孔子對上述個案的答覆，是融會教育、親情、理性各方面圓滿解決問題的思惟。

## 貳、中國傳統倫理的實踐

中國傳統倫理的實踐是有次序的，即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盛慶萊將此次序譯為：「Things being investigated, knowledge become complete. Their knowledge being complete, their thoughts were sincere. Their thoughts being sincere, their hearts were then rectified. Their hearts being rectified, their persons were cultivated. Their persons being cultivated, their families being regulated. Their families being regulated, their states were rightly governed. Their states being rightly governed, the whole kingdom was made tranquil and happy.」（Sheng, 1993）。

據此，中國傳統倫理的實踐可分為兩個階段：其一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這是指個人的人格成長（德育）部份；其次是「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社會實踐的部份。

### 個人人格的養成

「格物、致知」是對心外世界的認知，或對客觀知識的追求。儒家或佛教都是很重

視知識和教育的，也都認為：知識是倫理、道德的基礎。佛教更明確指出，無正確的知識是造成倫理、道德問題最根本的因素<sup>③</sup>。「誠意、正心、修身」是人格、道德養成的過程。此更詳細地說，這過程就是「定、靜、安、慮、得」。褚柏思認為：「儒家在佛學未傳來以前，本有其心性之學以及戒定慧三學與其止觀的。此與佛學，僅是詳略之分，而非本質之異。佛學傳來後，始能落地生根，同流並進」(褚, 1986)。所以，儒家和佛教都認為：心的清靜的倫理、道德的基本。因此，修心也就成為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實踐必要的基本功夫。

## 儒家倫理、道德在社會上的實踐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倫理、道德在家庭和社會、國家上的實踐。儒家這部份實踐可分為二，其一是以家族為中心的社會基礎結構，其二是政府的結構。前者在(Hsieh, Hsieh and Lehman, 2003)一文中曾作介紹，茲不贅述。在孔子的時代，孔子和他的弟子並沒有得到實踐的機會。這個理想直到漢朝實行「罷除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才得大顯身手。漢朝政府體制是依據儒家思想規劃的，所以此政府體制即儒家倫理、道德在政治上的實踐。漢朝政府體制對漢後的各朝代而言，是一個典範；漢後的政府體制大多尊循漢的體制為藍本略加修改而成。這傳統是中華帝國的特色。中華帝國之所以能綿延約二千一百年(約西元前 200 餘年至西元 1911 年)，不能不歸功於儒家倫理、道德在國家體制上實踐所產生的力量。

### 倫理與政治體制、教育、考試制度的結合——士大夫階級的建立

牟宗三認為：中華帝國基本上是由兩個集團構成：一是皇帝、皇親國戚和宦官，其次是以宰相為首的官吏。皇帝和皇親國戚是貴族階級，宦官是伺候皇帝的僕人。官吏是由士大夫中公開選拔出來的。所以，以宰相為首的集團即士大夫階級，這是中華帝國真正掌握治權的一群人(牟, 1985, 第 47 頁)。

傳統的中國社會由「士、農、工、商」四大職種組成。「士」即士大夫，也就是儒生、學者。「士、農、工、商」並無世襲制度，也沒有轉業的限制。這表示人民有就業，或選擇職業的自由。

中國人有句諺語：「學而優則仕」，意指只要學有所成，學者都可以「出任」，也就是做官。出任需經過考試公開選拔，即科舉制度。士是一群特殊的學者，其養成有其基本的思想和條件。孔子說：「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漢·董仲舒說：「正其宜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宋·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類似上述之諺語名言，各朝皆有，不勝枚舉。總而言之，士當以天下為己任；其實，這即是儒家倫理、道德實踐，也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層次。

士有三種出路，一是經科舉考試後為官；其次是在私塾、書院從事教育；再次的歸隱。從事教育是續儒家之命脈。儒家的教育是「有教無類」的。換言之，國家並沒有規定什麼人可以，或什麼人不可以受教育。所以，受教育的機會基本上是人人平等的。這也就是表示，知識的擁有、傳播是自由平等的。

士的選拔是以德為本。孔子說：「三十而立」，此「立」的意思是指道德、學識均已有成<sup>⑨</sup>。比較道德與學識二者，儒家認為道德比學識更重要。所以參加科舉鄉試之基本要件是人格上無重大缺憾，而有孝聞、義行者優先。這表示：儒家把德育和知育緊密結合，構成了傳統中國教育的兩個軸心。所以，儒家倫理的實踐又和教育結了不解之緣。

對於士，我們可以這樣理解：儒家倫理在政治方面的實踐，規劃出一個特殊的學者階級——士大夫，他們的倫理、道德要求嚴格，其格局、氣度宏大，是被教育作官吏來治理國家的。中華帝國的皇帝、皇親國戚和太監作亂，可以導致該朝代滅亡，然而，只要士大夫的傳承不斷，中國總是在經過短期混亂的局面後，由士大夫輔助另一個朝代，重振中華帝國的大業。換言之，儒家倫理「士」的實踐，是使中華帝國承先啟後綿延 2100 餘年的主要功臣。

在上的實踐中，人民有各種的自由，諸如：選擇職業、教學、學習、知識的擁有和傳播、以及參加科舉考試等。此即儒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思想的實踐。

## 參、資訊時代的省思

倫理理論的研究和實踐是有距離的。實踐需要的是完整的方案 (total solution)，涉及政治、宗教、教育、學術、法律、社會工作、家庭制度、社會建設……等等因素。

任何倫理的實踐，久而久之，免不了會異化。異化是屬倫理實踐的範疇，理論研究可以不理會異化，倫理實踐卻不能不未雨綢繆。一般認為，中國人是很務實的，換言之，中國人做事，常常不會忘記原來的目標。這務實的態度，是防止異化的良方。

佛教的倫理思想和方法，在中國倫理實踐中佔有一席之地。佛教對善、惡的判定，對正確知識的重視，眾生平等的思想、以及修心養性的具體實踐方法，一般認為比儒家更深入、更具體。此部份應予以補充。

資訊時代和傳統社會有什麼不一樣？這是作資訊時代倫理探討不能不明白的事。資訊時代的傳播情境，包括傳播觀念、方法、程序（過程）、效果、反應速率、所用的表現系統、設備、技術、所需的素養、甚至於傳播的對象、受播者對資訊的理解 (understanding)、詮釋等等，都與傳統社會有很大的差異。這些因素幾乎無一例外影響的倫理的實踐。所以，研究傳播倫理、資訊倫理、以及一般的倫理，已經是一個整體的問題，不宜單打獨鬥。

現在需要研究的倫理，應不局限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宗教、一種政治思想……應不分貧富、先進或落後……應有四海一家、為全人類的胸襟。

---

註：

- ① 梁實秋 edited,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Far East Book Co., 2000
- ② 牟宗三是現代的儒學學者，被譽為 1950-1980 期間的三大新儒學學者之一。關於「怵悌惻隱之心」請參閱（牟，1985），第 13 至 19 頁。
- ③ 同上，第 14 頁。
- ④ 人人皆有「怵悌惻隱之心」的說法，與佛教認為眾生皆有「佛性」有異曲同工之處。
- ⑤ 佛教說人人皆可成佛，於此言亦有相似之處。
- ⑥ 請參考 2005 年 7 月 11 日臺灣聯合報的紐約時報第 6 版："The Urge TO Conform Can Impair Judgment"，以及該文之中譯：「隨波逐流 損傷獨立判斷力」。依此發現比照 Kohlberg 的人格發展理論，成熟的人格是在腦部處理感情的區域養成的，理性可以成就的只是屈從社會公意層次的人格。（可參考：Gerald D. Baxter and Charles A. Rarick, *Education for Moral Development: Kohlberg's Stages of Moral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ve Educ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243-248, 1987）。
- ⑦ 請參考：丹尼爾·高曼(Daniel Goleman)主編，李孟浩譯《情緒療癒 (Healing Emotions)》立緒文化，新世紀叢書 36，1998。第一部：倫理學，第 10 至 52 頁。
- ⑧ 佛教認為，正確的知識如同光明。此處「無正確的知識」即指佛教說的「無明」。佛教說識，包括了正確的和不正確的認知。所以佛教不講「無知」而稱「無明」。
- ⑨ 古本注「立」為「德成之謂」。
- ⑩

## 參考資料

- (牟, 1985) 牟宗三著，《道德的理想主義》，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85 年 9 月修訂六版
- (褚, 1986) 褚柏思，《中國禪宗史話》，臺灣·高雄，佛光史傳叢書 3100，民國 63 年初版，75 年 10 月修訂三版，第 4 頁。
- (Sheng, 1993) Ching Lai Sheng, *Philosophical Papers*, Taipei, Tamka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2.
- (Hsieh, Hsieh and Lehman, 2003)